

中国自杀率下降趋势的社会学分析^{*}

张 杰 景 军等^{**}

摘 要：中国自杀率在 1987—2008 年间呈显著下降趋势。运用国家有关数据描述其间全国总自杀率及自杀率在性别、城乡人口中的分布，验证了全国自杀率逐年下降的显著性，并将自杀率与经济发展、流动人口等因素进行了相关分析与时间序列分析。中国的自杀率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及流动人口的增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以此作为理论假设，用扭力情境的变化解释中国自杀率 and 经济发展关系，显示中国自杀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很多原有冲突情境的弱化。

关键词：自杀率 扭力 经济发展 人口流动 自杀预防

作者张杰，中央财经大学特聘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院终身教授（北京 100081）；景军，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 100084）。

一、引 言

世界上每年大约有 100 万人死于自杀。在美国，自杀率在 11/100000 左右，每年有大约 30000 人自杀身亡。^①中国城乡总自杀率 20 多年前是在 17—23/100000 之间，每年因自杀夺去约 287000 人的生命，自杀是中国人口的第 5 位死亡原因，是 15—34 岁年龄段人口的首要死亡原因。^②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改善人民群众的精神卫生状况日显重要。自杀的预防和干预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有关公共卫生、精神卫生和社会工作的课题。

中国的自杀研究起步较晚，大约在 1980 年代之后才开始逐渐发展。在过去近 30 年的理论与实践，已发现西方的各种理论模型都不能充分解释中国人的自杀行为和中国的自杀率。例如，

* 本研究得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精神卫生研究所（NIMH）基金支持（US NIMH R01 MH068560），同时得到中央财经大学“211 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支持（09SH003）。

** 参与此文写作的还有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吴学雅、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讲师孙薇薇、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讲师王存同。

① NCIPC (National Center for Injur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eb-based Injury Statistics Query and Reporting System (WISQARS)*, CDC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07.

② Michael Phillips, et al., "Suicide Rates in China, 1995-99," *Lancet*, vol. 359, no. 9309, 2002, pp. 835-840.

当今西方最流行、解释率最高的模型是精神病的理论,在欧美和其他发达国家90%以上的自杀身亡者生前都患有精神疾病。^①在中国,近来的研究数据表明精神疾病仅占中国自杀身亡者的50%左右。^②

由于绝大多数的自杀者患有精神疾病,且绝大多数的研究者来自精神科领域,涂尔干的自杀社会整合理论并不被西方的研究者广泛接受,其有关自杀理论只是在非精神科领域,如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工作的学者中占有一席之地。^③不过,虽然涂尔干的社会整合和社会失范理论解释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上升的自杀率,但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状况却不符合这个判断。因此,中国学者有必要根据国情建设较为完整并更有实际意义的自杀理论,以更加有效地推动中国情境下的自杀预防工作。

二、1987—2008年中国自杀率的下降趋势

(一) 相关数据总结

研究自杀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自杀率在过去20多年中的下降趋势。迄今为止已有数篇正式出版的学术论文描述了这个状况,但大都使用中国局部地区的数据,且缺乏统一性。例如,两个不同的研究团队分别研究了中国部分地区从1991—2000年间的自杀数据,发现城乡男女的自杀率均有显著下降,从年龄上看,城市老年人和农村青年女性的下降幅度最为显著。^④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人员分析了从1982—2005年间山东省的自杀数据,发现其自杀率也是逐年显著下降,并且与经济各项指数成负相关关系。^⑤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人员分析了从1992—2003年间的辽宁省自杀数据,发现其城乡和男女自杀率均有明显下降,且男性的自杀率有超过女性自杀率的倾向。^⑥本研究借用较为完整的全国自杀率数据描述中国人在过去22年中自杀率的状况和趋势。这仅是对先前工作的深入和扩展,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阐释这一现象。

(二) 全国数据及统计方法

1. 全国自杀率数据的来源与拟合

目前国内并没有完整统一的数据库能够囊括国内二十多年来的自杀数据。为了保证数据的

① J. Mann, et al., "Toward a Clinical Model of Suicidal Behavior in Psychiatric Pati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vol. 156, no. 2, 1999, pp. 181-189.

② Michael R. Phillips, et al., "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in China: A National Case-Control Psychological Autopsy Study," *Lancet*, vol. 360, no. 9437, 2002, pp. 1728-1736.

③ Emile Durkheim,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trans. John A. Spaulding & George Simps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④ Paul Yip, et al., "Suicide Rates in China during a Decade of Rapid Social Changes,"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vol. 40, no. 10, 2005, pp. 792-798. 杨功焕等:《中国人群自杀水平的变化趋势和地理分布特点》,《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4年第4期。

⑤ Jie Zhang, et al., "Economic Growth and Suicide Rate Changes: A Case in China from 1982 to 2005," *European Psychiatry*, vol. 25, no. 3, 2010, pp. 159-163.

⑥ 杨晓丽等:《1992—2003年辽宁省城市居民自杀死亡率趋势分析》,《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2008年第2期。

权威性、连续性，1987—2008年的自杀数据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①

(1) 1987—1989年的数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健康统计年报。^②

(2) 1991—2000年数据来自公共卫生科学数据中心的全国疾病监测系统，由中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选取145个监测点，样本量为1000万人。^③

(3) 2002—2008年的数据来自《中国卫生统计年鉴》，^④资料来源主要是年度卫生统计报表，一部分来自抽样调查。统计分组情况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河北11个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重庆、广西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样本量为1亿人。由于该数据中没有全国、男性和女性的数据，因此我们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的人口数据推算，得出了全国、男性和女性的自杀率数据。^⑤

(4) 对于上述三种不同来源的数据，为了避免口径不一所带来的偏倚，我们采用间接标准化(indirect standardized)方法进行了适当调整，即每类数据均按照我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的人口年龄结构进行了重新加权处理。

针对1990年、2001年的数据缺失，我们采用时间变量对原始数据取log后做一般化线性回归(generalized linear regression)，并用回归方程的预测值填补了缺失值。

2. 经济增长的GDP数据

1987—2008年的GDP数据皆来自《中国统计年鉴》。^⑥

3. 农村流动人口数据

1987—2005年农村流动人口的数据来自盛来运的专著。^⑦“农村外出劳动力”指在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指16岁以上60岁以下有劳动能力者。2006年全国农村外出劳动力人口数据和农村劳动力数据来自国务院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要》。该提要明确农村劳动力总量为5.3亿。^⑧2007年全国农村外出劳动力人口数字来自《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问题分析》。^⑨2008年全国农村外出劳动力人口数据来自中央政

① 景军等在《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发表的《农村女性的迁移与中国自杀率的下降》一文也是使用这个数据，它讨论的是由农村女性迁移所产生的自杀率下降现象，本文则全面论述中国自杀率下降现象及其理论解释。

② 何兆雄、David Lester：《中国自杀率的性别差异》，《医学与社会》1997年第4期。

③ 该数据库为网上资料，数据详见：<http://www.phsciencedata.cn/CdcDataShare/inceptAction.do?method=doShow>，其中，部分数据有误：城市和农村两个类别的数据是颠倒的，我们对此进行了调整，并进行了加权处理。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2—2008），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2—2008年。

⑤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2003年农村和城市的整体自杀率数据明显偏低，我们根据全国人口数据、农村男性自杀率、农村女性自杀率、城市男性自杀率和城市女性自杀率对该年数据进行了重新估计。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7—200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2008年。

⑦ 盛来运：《流动还是迁移——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

⑧ 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要》，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

⑨ 熊军：《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价值工程》2010年第11期。

府门户网站。^① 2009年全国农村外出劳动力人口数据来自2010年1月21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布会的网络直播文字整理。2007—2009年度全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比重以《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公布的农村总劳动力为准。

4. 统计方法及统计软件

本文采用回归模型验证22年中国自杀率的整体趋势及显著性。对于经济增长水平和农村流动人口与中国自杀率的相关性分析,采用二元相关分析及ARIMA(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模型加以检验。ARIMA(p, d, q)模型运用于非平稳时间序列。^②建模过程为:首先识别模型,利用自相关分析和偏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时间序列的随机性、平稳性及季节性,并选定合适的p、q值,以拟合所分析的时间序列数据;随后进行模型中参数的估计,并进行显著性检验;最后对模型合理性进行检验,以判定该模型是否恰当,如不恰当,则返回第一阶段,重新选定模型,这一过程主要通过对残差序列进行检验来实现,若残差通过白噪声检验,则意味着所建立的模型已包含了原始序列的所有趋势,从而模型是合适的,否则需要改进。在数据探索中,我们对自杀率进行了log变换,但未进行差分处理,^③并利用ARIMA模型调适p、d、q的阶数。发现ARIMA(1, 0, 0)模型能很好地通过白噪声检验,与其它高阶模型相比,其AIC与BIC都是最小的(模型拟合较好)。因此,我们最终采用了该模型,所用统计软件为STATA 11。

(三) 过去22年全国自杀率下降的显著性分析

表1 1987—2008年间中国自杀率(1/100000)

年份	总体	男性	女性	城市	农村	城市男性	城市女性	农村男性	农村女性
1987	17.65	14.90	20.40	10.05	27.75	8.70	11.40	23.20	32.30
1988	17.25	15.00	19.50	9.00	26.70	8.00	10.00	23.10	30.30
1989	17.15	14.70	19.60	9.40	27.30	8.30	10.50	23.10	31.50
1990	17.35	14.87	19.83	9.48	27.25	8.33	10.63	23.13	31.37
1991	18.51	17.23	19.96	5.18	22.92	5.22	5.26	21.29	24.73
1992	18.36	16.82	20.08	5.07	22.67	5.75	4.52	20.40	25.13
1993	17.05	16.71	17.62	3.96	21.21	4.36	3.50	20.60	22.09
1994	17.39	16.55	18.31	5.52	21.23	5.76	5.28	20.07	22.48
1995	16.76	15.28	18.16	4.08	20.94	3.79	4.36	19.04	22.71
1996	13.50	12.82	14.21	3.52	17.24	4.36	2.64	16.00	18.51
1997	14.52	14.22	14.92	3.93	18.65	4.80	3.02	17.92	19.48
1998	14.99	15.81	14.22	4.04	19.05	4.55	3.49	20.05	18.19
1999	15.26	15.19	15.51	3.91	19.68	4.72	3.22	19.31	20.26
2000	13.56	13.87	13.32	4.70	16.85	4.83	4.55	17.28	16.54

① 《统计局:截至2008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2009年3月25日, http://www.gov.cn/gzdt/2009-03/25/content_1268173.htm,2011年5月18日。

② 其中,p为自回归的阶,d为差分的阶,q为移动平均的阶。本研究的p、d、q的阶数是根据多年的统计学经验并权衡自相关函数(ACF)和偏自相关函数(PACF)图的情况确定的。

③ 尽管使用差分能更好地拟合模型,但本研究未做差分处理,主要原因是使用差分处理会使模型参数的实际意义变得不明确。

续表 1

年 份	总体	男性	女性	城市	农村	城市男性	城市女性	农村男性	农村女性
2001	14.60	14.96	14.35	4.22	18.53	4.70	3.75	18.88	18.33
2002	13.03	13.35	12.69	12.79	15.32	13.16	12.40	15.24	15.40
2003	15.04	14.06	16.07	10.57	16.21	10.09	11.05	15.07	17.44
2004	10.83	9.86	11.86	7.36	11.96	7.50	7.21	10.63	13.37
2005	12.01	11.64	12.41	12.89	10.08	12.65	13.13	9.62	10.64
2006	7.92	8.26	7.58	5.02	9.26	5.39	4.65	9.56	8.95
2007	6.85	7.44	6.25	4.89	10.31	5.46	4.30	10.97	9.64
2008	6.60	7.00	6.20	3.59	8.25	4.00	3.18	8.62	7.87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全国总自杀率从 1987 年的 17.65/100000 降到了 2008 年的 6.60/100000, 前者大约是后者的 2.7 倍。将城乡和男女的自杀率分别分析, 发现农村的降低幅度大于城镇, 女性的降低幅度大于男性。农村女性在 1987 年的自杀率是 2008 年自杀率的 4.1 倍。表 2 对比了 1987 和 2008 两年全国自杀率按城乡和性别的统计状况。

表 2 自杀率在 2008 年下降的比率 (相对 1987 年) (1/100000)

	1987 年	2008 年	前后比率
总体	17.65	6.60	2.67
男性	14.90	7.00	2.13
女性	20.40	6.20	3.29
城市	10.05	3.59	2.80
农村	27.75	8.25	3.36
城市男性	8.70	4.00	2.18
城市女性	11.40	3.18	3.58
农村男性	23.20	8.62	2.69
农村女性	32.30	7.87	4.10

把全国总自杀率和历时年份进行相关分析, 发现二者高度负相关 (相关系数为 -0.885 , $p < 0.05$), 自杀率随年份的增长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再进一步采用一阶自回归模型 (First-Order Autoregressive Model) 对全国自杀率进行整体趋势分析。模型结果表明, 全国自杀率随年份的递增, 呈显著下降趋势。其中, 相对于城市自杀率, 农村自杀率的下降趋势更为显著; 在农村自杀率中, 农村女性自杀率呈显著的下降趋势, 而男性自杀率的下降趋势并不明显。本研究就此进行推断, 认为近年来导致全国自杀率下降的内在结构性原因, 可能在于农村自杀率的下降, 特别是农村女性自杀率的明显下降 (表 3)。^①

表 3 1987—2008 年中国自杀率的一阶自回归分析

	变 量	回归系数	标准差	t 值	p 值
全国自杀率	常数	-0.532	0.232	-2.290	0.034
	年份	-0.457	0.202	-2.264	0.036
男性自杀率	常数	-0.381	0.261	-1.458	0.161
	年份	-0.339	0.215	-1.581	0.130

① 本研究只是利用一阶自回归模型探索自杀率与经济发展间的相关关系; 因未有充足的抽样调查数据, 未进行多变量因果关系推断。

续表 3

	变 量	回归系数	标准差	t 值	p 值
女性自杀率	常数	-0.683	0.262	-2.606	0.017
	年份	-0.488	0.198	-2.464	0.023
城市自杀率	常数	-0.284	0.488	-0.583	0.567
	年份	-0.377	0.211	-1.784	0.090
城市女性自杀率	常数	6.532	1.348	4.844	0.000
	年份	0.526	0.193	2.724	0.013
城市男性自杀率	常数	6.554	0.841	7.796	0.000
	年份	0.361	0.213	1.693	0.106
农村自杀率	常数	-0.910	0.269	-3.388	0.003
	年份	-0.423	0.208	-2.033	0.056
农村女性自杀率	常数	-1.139	0.305	-3.733	0.001
	年份	-0.514	0.194	-2.651	0.016
农村男性自杀率	常数	-0.686	0.323	-2.120	0.047
	年份	-0.200	0.230	-0.871	0.395

注：AIC 为 1311.71；BIC 为 1331.68。

三、中国自杀率和经济增长、人口流动呈负相关

过去 30 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是一个奇迹。在这 30 年中，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以近 10% 的增长率上涨，从 1978 年的 3.65 千亿元飙升到 2008 年的 300.67 千亿元（人民币），人均 GDP 从 1978 年的 381 元上升到了 2008 年的 26698 元。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物质丰富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尽管农村的经济增长幅度远不如城镇，但大多数农村的生活环境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表 4 包括了从 1987 年到 2008 年这 22 年中每年的总自杀率、经济增长总率和人口从农村流动到城镇的数据。图 1 表明自 1987 年以来，中国经济上升发展的几个重要指标。

表 4 1987—2008 年总自杀率、经济增长总率和人口从农村到城镇的流动数据

年 份	全国总体自杀率 (1/100000)	GDP (千亿元)	人均 GDP (百元)	GDP 增长率 (%)	农村外出劳动力 人口 (百万人)	外出劳动力占农村 劳动力的比重 (%)
1987	17.65	12.06	11.12	11.60	10.50	2.7
1988	17.25	15.04	13.66	11.30	12.50	3.1
1989	17.15	16.99	15.19	4.10	15.00	3.7
1990	17.35	18.67	16.44	3.80	18.00	4.3
1991	18.51	21.78	18.93	9.20	21.40	5.0
1992	18.36	26.92	23.11	14.20	25.92	5.9
1993	17.05	35.33	29.98	14.00	27.52	6.2
1994	17.39	48.20	40.44	13.10	28.88	6.5
1995	16.76	60.79	50.46	10.90	30.00	6.7
1996	13.50	71.18	58.46	10.00	34.00	7.5

续表 4

年 份	全国总体自杀率 (1/100000)	GDP (千亿元)	人均 GDP (百元)	GDP 增长率 (%)	农村外出劳动力 人口 (百万人)	外出劳动力占农村 劳动力的比重 (%)
1997	14.52	78.97	64.20	9.30	38.90	8.5
1998	14.99	84.40	67.96	7.80	49.36	10.6
1999	15.26	89.68	71.59	7.60	52.40	11.1
2000	13.56	99.21	78.58	8.40	76.00	15.8
2001	14.6	109.66	86.22	8.30	90.50	18.8
2002	13.03	120.33	93.98	9.10	104.70	21.6
2003	15.04	135.82	105.42	10.00	113.90	23.3
2004	10.83	159.88	123.36	10.10	118.23	23.8
2005	12.01	183.22	140.53	10.40	125.78	24.2
2006	7.92	211.92	161.65	11.10	131.81	24.8
2007	6.85	257.31	195.24	13.00	114.80	21.66
2008	6.60	300.67	226.98	9.00	140.41	26.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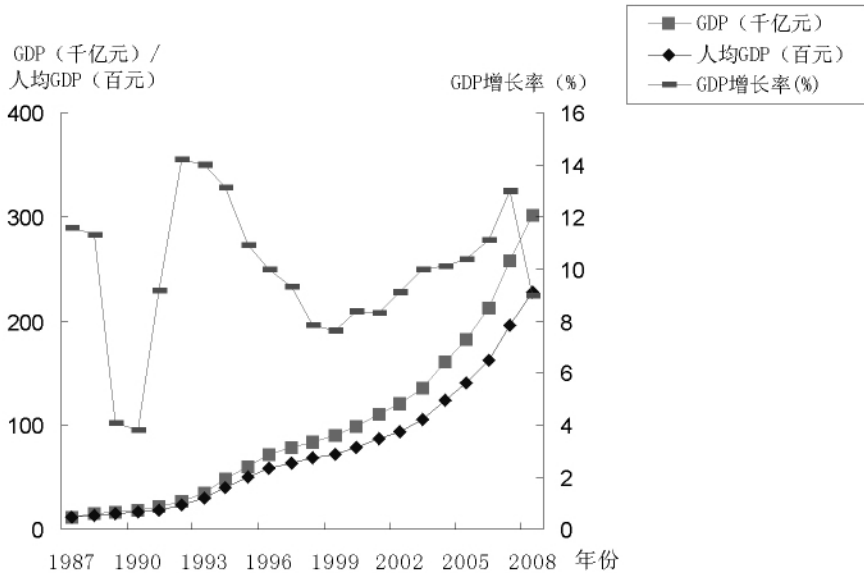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经济发展指标逐年趋势 (1987—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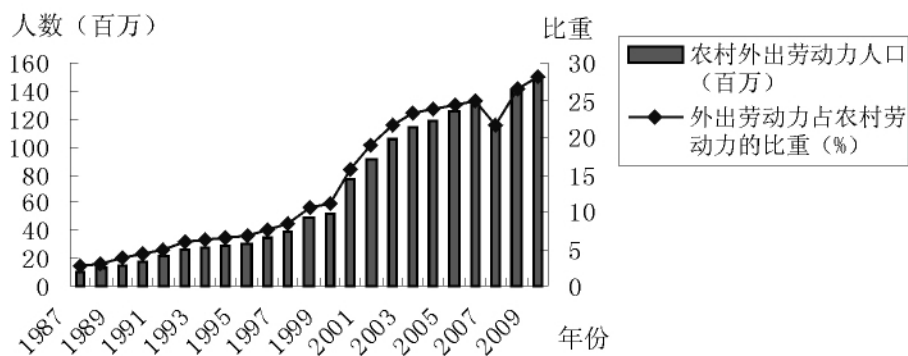


图 2 农村外出劳动力数量逐年增加的趋势 (1987—2009)

过去 30 年, 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庞大的流动人口, 作

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不仅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还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迁，人口的城乡分布、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也随之变化。^①图2描述了自1987年以来，中国从农村向城镇流动的人口数量呈递增趋势，农村外出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也逐年增加。

过去22年中每年的自杀率和同期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关系可以用图3直观地表达出来。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全国自杀率与经济发展（人均GDP）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959， $p=0.000$ ）。本研究进一步采用ARIMA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见表5模型1）。为了分析数据平滑，本文对全国人均GDP采用对数取值，全国自杀率采用一阶差分转换。分析识别模型为ARIMA(1, 0, 0)模型，根据残差的自相关检验及ACF、PACF图，说明残差为白噪声序列，模型诊断得以通过。数据结果表明，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全国自杀率显著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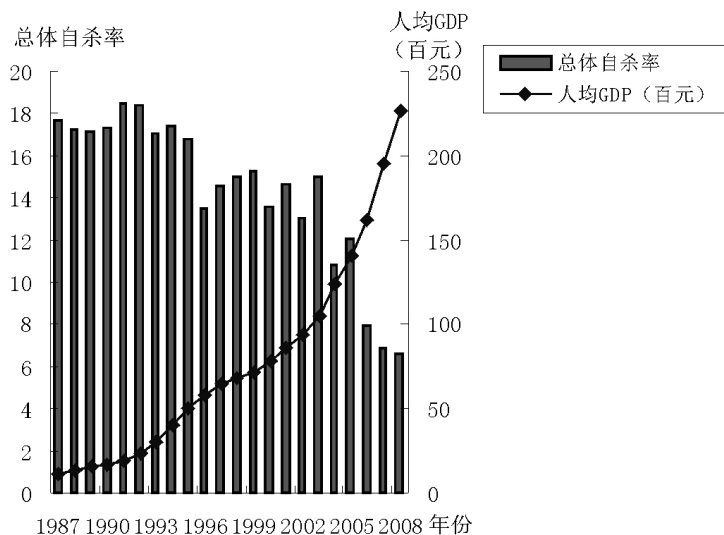


图3 全国总体自杀率与人均GDP逐年关系（1987—2009）

全国自杀率的下降，主要在于农村自杀率的显著下降，而农村自杀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可能在于农村外出打工人口的逐年增加，本文对这一假设进行数据验证。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农村自杀率与农村外出打工人数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885， $p=0.000$ ），与农村外出打工人口占农村劳动力比重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926， $p=0.000$ ）。对农村自杀率与农村外出打工人口比重的关系，进一步采用ARIMA(1, 0, 0)模型进行分析，为了平滑数据，农村外出打工人口比重采用了对数化处理。结果如表5模型2中显示（该模型通过白噪声检验），两因素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农村外出打工人口比重上升，而农村自杀率随之下降。

表5 两个ARIMA模型分析

模型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差	t 值	p 值
1	全国自杀率	常数	4.164	2.134	1.951	0.067
		全国人均GDP	-1.246	0.564	-2.210	0.040
		AR(1)	-0.571	0.192	-2.973	0.008

① 段成荣等：《中国女性流动人口状况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09年第4期。

续表 5

模型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差	t 值	p 值
2	农村自杀率	常数	35.536	2.745	12.947	0.000
		农村外出打工人口比重	-17.181	2.631	-6.531	0.000
		AR (1)	0.624	0.193	3.227	0.004

四、传统自杀理论及其不足

国外普遍流行的传统自杀理论大致有三种,即现有关于自杀行为的动机及危险因素研究:精神疾病因素、心理障碍因素、社会结构因素。^①大多数研究成果表现在对自杀行为危险因素的罗列和排序上,缺乏理论思考和提炼。在自杀理论和自杀干预研究大多集中在精神病领域的西方,^②自杀研究学者主要是精神科医生。最主要的预防干预方式是药物治疗,给重度抑郁患者或有自杀倾向的病人施用抗抑郁的昂贵药物。此外,精神科医生还研发了数种心理疗法来配合药物治疗。^③尽管投入如此之多,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的自杀率在过去的近 100 年中持续平稳并没有下降。^④精神病导致自杀的理论受到了质疑,尤其在过去 10 多年里美国精神科医生对新型抗抑郁药 SSRI 效用的研究结果发生不一致后,人们开始质疑为什么年轻人服用 SSRI 之后抑郁症消除了但自杀行为增加了?^⑤此外,尽管在西方超过 90% 的自杀者都被诊断出患有包括抑郁或酒精/药物滥用等精神疾患,^⑥自杀者在整个精神病人群中却占很小的比例。^⑦更重要的事实是,中国全国自杀率在 22 年间降低了近 2/3,而在这期间全国的精神病防治工作并没有大规模开展,农村精神科医生的数量也没有增加。^⑧精神疾病可能是自杀的重要条件,但并非自杀的必要条

- ① Jie Zhang and Darwin L. Thomas, "Familial and Religious Influences on Suicidal Ideation," in Daniel K. Judd, ed., *Religion, Mental Health and the Latter-Day Saints*, Provo, UT: Religious Studies Center at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1999, pp. 215-236; Jie Zhang, "Marriage and Suicide among Chinese Rural Young Women," *Social Forces*, vol. 89, no. 1, 2010, pp. 311-326.
- ② K.J. Kaplan and M. Harrow,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s as Risk Factors for Later Suicidal Activity in Schizophrenics Versus Depressives,"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vol. 26, no. 2, 1996, pp. 105-121. C. L. Rich and B. S. Runeson, "Mental Illness and Youth Suicid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vol. 152, no. 8, 1995, pp. 1239-1240.
- ③ Gregory K. Brown, et al., "Cognitive Therapy for the Prevention of Suicide Attempt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vol. 294, no. 5, 2005, pp. 563-570.
- ④ A. Shah,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l Population Suicide Rates and Mental Health Funding, Service Provision and National Policy: A Cross-National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Psychiatry*, vol. 56, no. 4, 2010, pp. 448-453.
- ⑤ Dean Fergusson, "Association between Suicide Attempts and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Systematic Review of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 330, no. 7488, 2005, p. 96.
- ⑥ NIMH, *Research on Reduction and Prevention of Suicidal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2003.
- ⑦ J. Mann, et al., "Toward a Clinical Model of Suicidal Behavior in Psychiatric Pati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vol. 156, no. 2, 1999, pp. 181-189.
- ⑧ Shengyong Wang, et al., "Injury-Related Fatalities in China: An Under-Recognised Public-Health Problem," *Lancet*, vol. 372, no. 9651, 2008, pp. 1765-1773.

件,更不是充分条件。从另一个角度说,精神疾病有可能和自杀行为是共病(或称并发症),是由某种共同因素产生的。

国外有自杀研究学者立足于心理障碍的探讨。^①曼等提出并验证了自杀的“压力—因素”理论,但也只是基于精神疾病患者的临床理论模型。^②海瑞根自杀行为心理学模型注重“状态—特质”的相互作用过程,似乎更有概括性,但其实质是神经生物学的。^③更重要的是,西方大部分自杀研究是从医学生物学角度着手并停留于探索层面,缺少理论概括。

研究者也有从社会结构出发,探讨社会变迁对人的自杀行为的影响。在社会学领域,越轨行为的压力理论(Strain Theory)出现已超过一个世纪,其基础是涂尔干的社会失范理论。^④默顿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越轨行为的社会失范压力理论。^⑤爱格纽修订了压力理论,建立了普通压力理论(General Strain Theory),扩大了压力理论的范围,并增加了一些变量。^⑥现有的社会学理论和模型有较大的局限性。例如越轨行为的压力理论并未考虑自杀,涂尔干和默顿也都没有提供与压力有关的测量工具。爱格纽虽为普通压力理论设计了测量压力的方法,但考虑到个人在看待客观的压力时有着不同的主观方式,^⑦其测量仍需进一步探索。涂尔干的社会整合和社会调节理论与当今世界上流行的精神病理学模式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也存在着矛盾。

涂尔干的社会整合理论指出,随着工业化发展、城市化推进和现代化的深入,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压力提高,人际关系淡化。现代化使人们的社会整合力减少,失范程度增加,进而导致自杀率上升。社会学家研究了芬兰从1800年到1984年的现代化指数和自杀数据,发现随着现代化的进展,芬兰社会的自杀率逐渐提高。^⑧学者们也研究了日本从1980年到1990年间47个县区人口流动和自杀死亡的资料,发现在移民幅度增大时,自杀率也随之上升。^⑨另有社会学家研究了法国1825—1830年间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与犯罪及自杀的数据,发现这几年法国北部自杀率出现增长而在南部凶杀率表现出上升趋势,^⑩作者用物质文明和人性制约之间的冲突解释

-
- ① A. T. Beck, et al., "Hopelessness and Eventual Suicide: A 10-Year Prospective Study of Patients Hospitalized with Suicidal Ide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vol. 142, no. 5, 1985, pp. 559-563; Jie Zhang and Shenghua J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Suicide Ideation in China," *Genetic, Social, and 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vol. 124, no. 1, 1998, pp. 79-94.
- ② J. Mann, et al., "Toward a Clinical Model of Suicidal Behavior in Psychiatric Pati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vol. 156, no. 2, 1999, pp. 181-189.
- ③ K. V. Heeringen, "The Neurobiology of Suicide and Suicidality,"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vol. 48, no. 5, 2003, pp. 292-300.
- ④ Emile Durkheim,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 ⑤ R.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57.
- ⑥ Robert Agnew, et al., "A New Test of Classic Strain Theory," *Justice Quarterly*, vol. 13, no. 4, 1996, pp. 681-704.
- ⑦ Robert Agnew, "Building on the Foundation of General Strain Theory: Specifying the Types of Strain Most Likely to Lead to Crime and Delinquenc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vol. 38, no. 4, 2001, pp. 319-361.
- ⑧ Steven Stack, "The Effect of Modernization on Suicide in Finland: 1800-1984,"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vol. 36, no. 2, 1993, pp. 137-148.
- ⑨ Akiko Otsu, et al.,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gration of Workers on Suicide Mortality in Japan,"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vol. 58, no. 6, 2004, pp. 1137-1146.
- ⑩ Hugh P. Whitt, "The Civilization Process and Its Discontents: Suicide and Crimes against Persons in France, 1825-1830,"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16, no. 1, 2010, pp. 130-186.

了这些发现。当然，任何一个理论都不会是完美的，学者们也在寻求其他的解读方式。中国的自杀率不像多数国家那样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流动人口的增加而上升。传统的社会学理论很难解释当今中国的自杀率。

五、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

（一）自杀的扭力理论

为克服以往理论的不足，我们引入“不协调的压力”或“扭力”（Strain）概念，说明一个人遭遇冲突并要做出决定时认知方面的心理体验。^①当个体无法放弃两个冲突因素中的任何一个时，就会体验到心理痛苦，即压力或扭力。心理的痛苦迫使个体做出理性选择，可能通过自杀缓解扭力。

不协调的压力不同于单一压力，至少包含两个冲突的压力或者两个变量，其主要来源有：1. 不同价值观的冲突：当两种相抵触的社会价值观或信念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冲突时，个人就会体验到价值观方面的压力；2. 愿望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在个人愿望或高目标期待与其必须面对的现实之间有较大差距时，个人就会体验到愿望压力；3. 相对剥夺或相对贫困：当处于贫困的人发现和与自己背景相同或相似的人却过着优越的生活时，就会体验到相对剥夺的压力；4. 应对危机技能的缺乏：面对人生中的危机，一些人缺乏应对手段，于是体验到危机和应对手段缺乏所带来的压力。我们将不协调的压力简称为扭力。

扭力形成后，在其导致自杀行为的路径中受到社会和心理因素的调节，以及心理病理学因素的干预或强化（图5）。由于这种中间因素的存在，多数体验到扭力的人并未选择自杀。扭力与自杀之间的关系可能被社会整合、社会调节以及诸如个性等心理因素所缓解。社会和心理调节因素应先于扭力和自杀行为的关系。心理病理学的干预或强化因素包括物质滥用和酗酒在内的诸多精神障碍，发生于扭力和自杀行为之间，同时是前者的结果和后者原因。干预是对症状的抑制或治疗从而降低自杀的可能，强化则是加重症状进而加大自杀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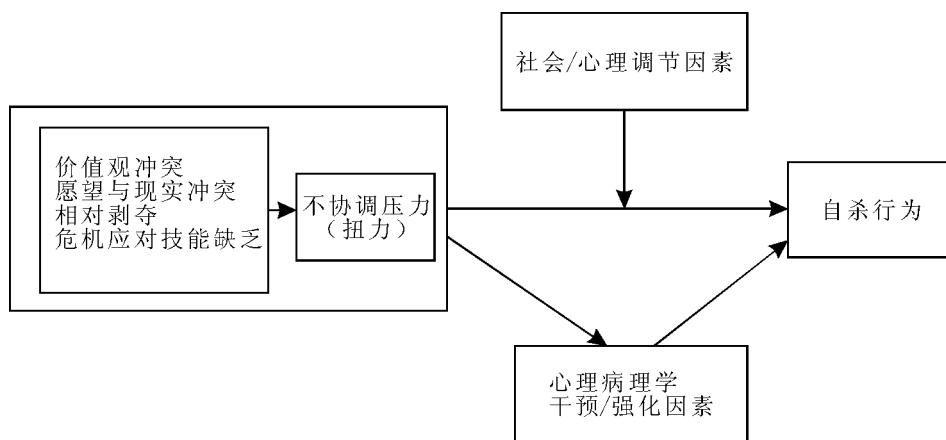


图5 自杀的扭力理论示意图^②

① 张杰：《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初探》，《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5年第11期。

② 张杰：《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初探》，《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5年第11期。

(二) 理论基础

以往的社会学家对于我们建构关于自杀的扭力理论都有所贡献。从涂尔干到默顿再到爱格纽,越轨行为的压力理论出现在社会学领域已超过一个世纪。压力有两种理解:社会进程的压力和个人经验的压力。^①压力理论的基础是涂尔干的社会失范理论,后来犯罪学方面的思想家使用社会失范理论解释越轨行为。社会失范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指社会规范缺失,或者在一种情境中毫无规范可言,意味着社会没有法律、习俗及其他标准约束成员的行为。由于社会调节机制不足,一些人期待从生活中无限度地获取,当他们的期望得不到满足时可能会体验到较大的挫折感。这样,社会失范就导致挫折或者某一类压力。^②

根据以上概念,默顿提出了关于越轨行为的社会失范理论:社会通过强加给个体生活中的规范来迫使个体做出越轨行为。当一个人期望和别人一样成功,但社会没有提供合法的途径并加以限制时,就产生了压力。^③换句话说,社会过于强调成功的目标,然而对如何获得成功的合法途径方面强调不够,就会导致压力。涂尔干的社会失范概念的前提与默顿的理论恰恰相反,涂尔干假设缺乏规范的约束导致越轨行为,这与弗洛伊德的假设相似,越轨行为的发生在于社会没有成功地限制个体的冲动。

默顿关于越轨行为的压力理论也未能直接解释自杀。对于社会文化目标和合法化途径之间存在断裂而造成的压力方面,默顿提出了五类调整的方法,其中之一便是逃避现实,即从社会退缩到自我的保护壳中。逃避现实者不关心成功与否,也不在乎有没有工作。这样做的有精神病患者、被遗弃者、无业游民、流浪汉、妓女、酒鬼和药物滥用者。另外,自残、自杀也可以包括在默顿列举的例子当中,尽管他的原著没有提到。

涂尔干和默顿的论述以及从社会失范理论发展而来的压力理论,一直是解释越轨行为和犯罪的主要理论。涂尔干侧重于社会约束的减少及其在个体方面造成的压力,而默顿研究社会强调的目标与社会规范之间的社会失衡。

爱格纽认为,压力既不是结构化的,也不是人际间的,而是情绪的。当个体觉察到逆境时,会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并引发个体从事犯罪活动。当个体发觉自己与别人付出同样的劳动,却没有得到同样的回报时,就会感到痛苦。借助违法行为也许更能成功应对与消极人际关系相关联的消极情绪。^④消极关系中的苦恼可直接转化为愤怒,并可能间接地导致严重的犯罪和攻击行为。反过来,愤怒对犯罪和越轨行为也有显著影响。研究表明,愤怒与犯罪、越轨行为是有关联的。爱格纽把愤怒看作最关键的一种情绪,因为愤怒几乎总是直接表现出来。^⑤但是,爱格纽没有把指向个人内部的挫折感或者愤怒纳入其理论框架。

爱格纽的普通压力理论尝试从目标而不是金钱的角度来思考压力理论,考虑到个体的社会

① Emile Durkheim,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② Robert Agnew, "Foundation for a General Strain Theory of Crime and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vol. 30, no. 1, 1992, pp. 47-87.

③ R.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④ T. Brezina, "Adapting to Strain: An Examination of Delinquent Coping Responses," *Criminology*, vol. 34, no. 1, 1996, pp. 39-60.

⑤ Robert Agnew, "Foundation for a General Strain Theory of Crime and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vol. 30, no. 1, 1992, pp. 47-87.

阶层、对未来的期望、与罪犯的联系等因素。^① 其主要概念基础是“当人们受到糟糕的待遇时，可能变得沮丧并卷入犯罪”。^② 爱格纽区分了压力的不同类型，并为普通压力理论设计了测量压力的方法。他还用实证的方法探讨了压力和犯罪之间的联系，并提供了政策性建议。

虽然以前有关越轨和犯罪行为的压力理论没有考虑自杀，却对建立关于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有重大的启示意义。但后者不是对前者的发展、修订或提炼，因为自杀性的越轨行为在本质上不同于犯罪性的越轨行为。自杀是指向内部的暴力行为，没有外在的其他受害者，犯罪通常是指向外部的，有其他受害者。这样看来，这两类“暴力”可能产生于不同的压力源。

本文所阐述的不协调压力或扭力理论不同于简单的压力。人们经常可以感受到压力，压力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单变量现象。当我们说在工作中有压力时，是说有很多工作要做，或者要赶时间，或者与同事或老板的关系有些紧张。不协调的压力至少包含两种压力或者两个变量，类似于认知不协调，如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愿望与现实、个人的地位与他人的地位、危机与应对能力等。作为认知的不协调，压力是一种心理挫折感，甚至是痛苦，个人必须找到途径以缓解之。事实上，压力不协调要比认知不协调更为严重，更让人沮丧，威胁性更强；极端的解决办法就是自杀（参见图5）。

（三）导致自杀的四种不协调压力

自杀行为可能由某一类不协调的压力促成。我们发现，有四类不协调的压力，每类压力都有特定的来源。每个压力源必须包含至少两个相互冲突并且被个体感知到的社会现实因素。

扭力情境之一：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两种相互抵触的社会因素内化于个人价值观系统并且是相互冲突的两种信念。一名教徒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把非宗教的主流文化和宗教信仰都看得非常重要，这个教徒就会体验到压力。再如，美国第二代移民既要遵守家庭强化的本民族文化传统，同时还要在学校适应美国文化，如果这些孩子没有有效地把这两种文化自觉地分开接受，他们就会感到压力。另外，在发展中国家可能存在传统的集体主义和现代的个人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当个人在生活中把两种相互抵触的价值观同等看待时，就会体验到严重的不协调压力。应该指出的是，当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存在但没有被内化或被强行接受时，不协调的压力也不会产生。

扭力情境之二：现实与愿望之间的冲突。这关涉到两个相互冲突的社会体验：一是个人美好的理想或目标，另一个是可能阻碍其获得目标的现实。生活在美国的人期望变得富有，或者至少与其他美国人一样获得中等程度的成功；现实中，往往因为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同而并非机会均等，如果现实与愿望相差太远，人们就会体验到不协调的压力。

扭力情境之三：相对剥夺或相对贫困。在这种情况下，相互冲突的社会现实是：个人不幸的生活困境与知觉到的他人的富裕。如果一个人住在贫困地区，大家都一样，他未必会感到痛苦或者被剥夺；如果这个人了解到和他同样情况的人却生活得富裕，他就会认为受到了剥夺，因此情绪低落。在一个穷人和富人处于两极分化、地理上却比较接近的社会中，人们更有可能感受到贫富悬殊下的相对剥夺。知觉到的“相对剥夺”越多，压力就越大。

扭力情境之四：应对危机技能的缺乏。生活中的危机与适当的应对方法形成了相互冲突的

① Robert Agnew, et al., "A New Test of Classic Strain Theory," *Justice Quarterly*, vol. 13, no. 4, 1996, pp. 681-704.

② Robert Agnew, "An Overview of General Strain Theory," in P. Raymond, ed., *Essays in Criminological Theories*, LA: Roxbury, 2000.

社会因素。只单纯地经历危机不一定会有这种压力。一个危机只是一种普通压力或者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源,对于那些缺乏应对技能的人来说,他们会体验到不协调的压力。对于那些不知道如何应对负面生活事件的人来说,诸如财产损失、失去地位、丢面子、离婚、失去爱人等危机都可能导致严重的不协调压力。应对经验和技能越少,当危机发生时压力感就会越强烈。

(四) 扭力与自杀关系的初步验证

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对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或扭力理论做了一些初步的实证研究并已经发表于不同的中英文期刊,这对新理论的建构奠定了良好基础。最初的验证是在2003—2004年。我们在大连随机选取了195名男女大学生和292名高中男女学生作为被试,用问卷测量了价值观的扭力和自杀意向。结果发现,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可能在个体身上造成更大的压力,并与自杀意向呈显著相关。一方面,传统儒家的性别偏好思想根深蒂固,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性别平等观念已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这两种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在农村女性个体方面会体现为较为强烈的压力,从而有可能导致自杀行为。^①

2005年我们收集了155个中国农村青年自杀的案例,并对每个案例进行了质性分析,发现全部的自杀死亡者在实施自杀前均体验过至少一种扭力。四种扭力体验由强到弱依次为应对扭力(100%)、愿望扭力(81%)、相对剥夺扭力(72%)和价值观扭力(45%)。男性的应对扭力得分及失去金钱或投资失败因素得分高于女性。价值观扭力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愿望扭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②

我们也对美国的数据做了分析。资料是20个自杀死亡者的遗书和20个自杀未遂的遗书。对遗书内容的质性分析显示,这两个自杀组在测量的扭力数目上差别不大,并且大都集中在愿望扭力和应对扭力上,而价值观的扭力和相对剥夺的扭力相对少一些。另外,自杀者的年龄越大,愿望扭力和应对扭力也就越强烈。^③

我们对2006年发生在辽宁和湖南11个县的105例15—34岁自杀死亡者的亲友做了访谈,请被访者描述自杀者生前的环境和自杀缘由。然后用SPSS Text Analysis for Surveys软件分析每一个案例中的词语,发现只有43%的自杀者可能患有以抑郁症为主的精神疾病,这105位自杀者都经历过至少一种扭力。在这四种扭力中,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感到理想与现实的扭力,而年轻组的自杀者(15—22岁)比年长组(23—34岁)更多感到应对危机的扭力。^④

六、结论及政策涵义

以往学者在研究中已经发现,中国的自杀率在过去20多年中呈下降趋势,但这些学者使用的数据或是地区性数据或是较短时间段的数据。本文使用了较为完整的1987—2008年国家层面的自杀数据,比较完整地描述了中国自杀率在一个较长时间段的下降趋势。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是一个经过联合研究梯队整理过的官方数据。这些官方数据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被公布过。

① 张杰、宋振韶:《自杀压力不协调理论的初步验证》,《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6年第6期。

② 张杰、唐勇:《压力不协调与自杀:从155个案例看扭力体验》,《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9年第11期。

③ Jie Zhang and David Lester, “Psychological Tensions Found in Suicide Notes: A Test for the Strain Theory of Suicide,” *Archives of Suicide Research*, vol. 12, no. 1, 2008, pp. 67-73.

④ Jie Zhang, et al., “Psychological Strains Found from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05 Chinese Rural Youth Suicides,” *Archives of Suicide Research*, vol. 13, no. 2, 2009, pp. 185-194.

但我们找到的原始数据有两个较大的问题，一是数据缺乏一致性，二是个别年度数据缺失。为此，清华大学医学社会学研究中心和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联合组织了一个数据挖掘小组，对原始数据予以清理和调整，把来自几个源头的原始数据整合成一个较完整并有一致性的数据库。此外，中国官方公布的全国性自杀数据仅包括三个变量：年份、城乡户籍和性别。^①因而，我们的研究不可能对区域、省份、职业、年龄或教育程度等变量加以考虑。

本研究所获得的数据有如下两个重大发现。首先，中国全国自杀率在 1987—2008 年间呈明显下降趋势。中国全国自杀数据的公布始于 1987 年。当时中国自杀率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较高水平，目前则处于较低水平。例如，1987—1995 年间，中国自杀率浮动于 18.51/100000 到 16.76/100000 之间；在 1996—2003 年间，中国自杀率有所下降；在 2004—2008 年间，中国自杀率出现明显下降，从 10.83/100000 降到 6.60/100000。其二，中国总自杀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人口自杀率的下降，其中又特别体现为农村女性自杀率的下降。中国农村人口的自杀率原来远远高于城市，近年出现了差距明显缩小的趋势。同时，中国女性自杀率也曾明显高于中国男性自杀率，这种差异近年趋于消失。该局面的出现与中国农村女性自杀率的显著下降有直接关系。例如，在 1987 年，农村女性自杀率（32.30/100000）曾明显高于农村男性自杀率（23.20/100000），之后出现下降趋势。到 2008 年，中国农村女性自杀率（7.87/100000）开始略低于农村男性自杀率（8.62/100000）。

我们认为，自杀率的明显变化是一个多重因素导致的结果。应用现有可及的数据，我们对 1987—2008 年间的自杀率数据和有关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的资料进行了相关性研究、时间序列及回归模型分析。尽管我们已经明确了经济增长与人口流动增长和自杀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但就本课题的资料和数据，还无法证实经济增长与人口流动和自杀率下降的直接因果关系，因为在这种相关研究中，我们无法明确和控制导致相关的干扰因素。以往的研究表明，西方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总是带来犯罪率、精神病的发病率和自杀率的上升，但是我们发现在中国自杀率没有上升，反而下降。对这种独特的中国现象，我们试图用自杀的扭力理论来解释。过去的研究已经多次证明心理扭力的降低能够减少自杀的危险，因此我们可以假设，经济发展所导致的自杀率下降是通过扭力的降低来实现的。假设路径是：经济发展→扭力降低→自杀率下降。

在使用扭力理论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关注扭力的作用，还强调了“扭力情境”，其中最主要的情境如，价值观的冲突，愿望与现实的冲突，相对剥夺的感受等。这些冲突在任何社会任何时期都普遍存在，但它们发生的情境会有很大的差异。在不同的情境中，扭力或冲突的激烈程度会非常不同，其后果也会很不一样。例如，中国农村的自杀问题往往与家庭矛盾缠绕在一起，而家庭矛盾的焦点之一是婆媳关系。^②农村家庭矛盾中有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例如夫妻间女性的从属地位，婆媳关系紧张等。这主要表现在价值观的冲突和愿望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从社会层面，经济的高速发展和青年农民有了选择进城打工的自由，这会降低某个方面的扭力，扭力的降低可以部分解释中国大陆自杀率下降这一现象。中国过去 30 年的改革带来了经济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和文化意识的重大转型。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环境和物质的丰富程度都有了改善和提高，这会降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也会减少相

① 年龄组仅出现在少数年份中，所以无法将年龄作为一个变量。

② Jie Zhang, "Marriage and Suicide among Chinese Rural Young Women," *Social Forces*, vol. 89, no. 1, 2010, pp. 311-326.

对剥夺感。本研究数据还表明,中国自杀率的下降主要来自农村居民自杀率的下降,而农村居民的自杀率下降主要来自农村年轻女性自杀率的下降。那么,在过去的30余年中,中国的经济改革给农村的年轻人特别是农村的年轻女性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大量的年轻农民工涌入城市,这不仅改变了农民工自身的生活状况,也给家乡带来了改善,对减少中国城乡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差别,起到了重大作用。从2004年开始中国逐步实施减免农业税政策,并实行农业补贴,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①虽然与城市生活相比尚有差距,与过去相比,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还是得到了一些提升。^②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某种程度上使中国农民缩小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也降低了相对剥夺的感觉。^③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中国农村年轻妇女的观念也得以改变。守家务农已经不是唯一的生活模式,多数人有了进城打工的可能;传统的婚恋观也有了改变,婚姻和家庭的自由选择成为可能。^④对农村年轻女性而言,脱离了传统的男尊女卑的生活环境,传统价值观和现代男女平等价值观之间的冲突逐渐淡化,这有效地降低了价值观冲突所带来的扭力感受。

青年农民进城打工会体验到相对贫困,并有可能受到歧视。但这些负面感受和收入的大幅增加及生活水平的提高相比,应该不是那么重要,否则他们就会回家继续务农,且新农民也不会再来了。事实上,农民工继续涌入城市。在将来的研究中我们要比较进城打工的农村男女和留守的农村男女在生活满意度、精神状况等方面的差别。扭力理论预见进城打工的农村男女要比留守的农村男女在生活满意度和精神状况等方面好得多。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伴随着中国自杀率的下降这一事实不同于以往西方的发现。^⑤如本文所述的芬兰和日本现象。国内近年来的研究也有类似西方的发现,如有农民工进城后不适应,并出现各种不良反应。“青年农民工实践世界里诸多冲突关系和限制因素直接导致他们难以适应和融入城市。”^⑥但进城打工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它给农民工、农民工家庭乃至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弊端,否则农民工自由进城打工的现象将不会持续下去。

如同过去30年的经济进步一样,中国许多方面的变化都有着浓厚的中国特色。研究中国问题,应从中国文化入手,充分考虑国情。中国经济过去30年保持每年高速增长的增长在世界上没有先例。在循序渐进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对生活改善的期望应该是可预期的。在持续高速发展的经济环境中,多数老百姓每年实现的有可能是高于期望的目标。这是不同于西方之处,也是涂尔干没有预料到的一个现象。快速的生活水平导致扭力的快速降低,进而导致了自杀率下降。

除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因素外,农民工进城打工是中国总自杀率下降的另一个特殊因素。对农民工而言,其生活的环境、生活质感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现实超过了期望,扭力就会降低或消失。农村人口自杀率的大幅度下降对全国总人口自杀率下降起到了重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收若干政策的意见》,2004年2月8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2/08/content_1303656.htm,2011年6月18日。

② 汝信等主编:《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③ 值得注意的是,进城打工不是一定会减缓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所带来的扭力。如年轻的二代农民工,他们的理想要比其父母高得多;由于年龄与环境等影响,他们对现实的满意度比父母低得多。

④ 张承芬、陈英敏:《当代农村青年婚恋观的调查》,《山东师大学报》2000年第5期。

⑤ 在西方社会,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必然带来犯罪率、社会问题和自杀率的提高。参见 Emile Durkheim,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⑥ 符平:《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实践社会学研究的发现》,《社会》2006年第2期。

大作用。尽管贫富差距仍然很大，但是，农民一般是与他们的过去相比，而不是与城里人相比。这里的逻辑关系是，国家整体经济上升导致民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引起生活满意度的提高和幸福感的提高。当然，生活水平整体提高并不会直接导致人们幸福感的提高；要点在于不是绝对提高而是相对提高，人们更在乎的是与周围其他人相比，自己是怎样的。^① 德雷克·博克在其新著中指出，生活水平的简单提高只会导致幸福感的暂时提高，过一段时间，人们的感受又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② 由此推理，待中国 GDP 达到一定高度停止快速进步时，中国自杀率下降趋势也会停止，并有回升的可能。

扭力降低和自杀率下降之间的关系是从经济发展、农民工进城和自杀率的负相关关系中得出的结论。本研究没有能够用实验的方法控制其他干扰变量从而认定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尽管本文作者及其团队在过去已经用局部的数据对自杀的扭力理论做了一些实证研究，仍然可以把扭力降低与自杀率下降的相关关系作为一项假设，为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理论的价值在于它的实效性，应该在此理论基础上建立一套危机干预和自杀预防的心理咨询模式，真正将科研成果付诸实践。

自杀的扭力理论是一个新的解释理论，在过去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初步验证，本文对先前理论不能解释之处做了补充工作。一个理论的建立和成熟化需要长时间的反复验证以及大量数据的支持。我们认为，通过研究者不懈的努力，收集大量数据并运用严格的科学手段，自杀的扭力理论可以成为一个有效解释自杀行为的社会学理论。

经济快速发展和自杀率显著下降在中国过去 20 多年中同时发生，我们试图用前者解释后者。但是，由于资料和数据缺乏还不能建立直接的因果关系。然而，当用扭力理论把扭力的缓解或降低作为中介变量（既是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也是自杀行为下降的原因）时，经济快速发展和自杀率显著下降这两个社会事实便能够在逻辑上联系起来。我们试图用一个微观的行为理论来解释自杀率这样一个宏观的现象，研究假设是社会经济水平的快速提高导致个人心理扭力的降低，扭力的降低导致自杀危险因素的减少。对这个假设的探索性研究可为今后中国乃至世界的自杀研究和预防提供启示。

〔责任编辑：刘亚秋 责任编辑：冯小双〕

① Deaton Angus, "In Pursuit of Happiness," *Lancet*, vol. 376, no. 9754, 2010, p. 1729.

② Derek Bok, *The Politics of Happiness: What Government Can Learn from the New Research on Well-Being*,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ublic policy implementation from being “fragmented,” it is advisable to introduce an impetus from higher-level authorities, something unique to the Chinese system; to practice hierarchical and multi-objective governance; and to take measures for coordination, trust, cooperation, integration, resource exchange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mplementing public policy across sectors and governments at different levels. This can be regarded in a sense as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policy.

(5) Bureaucratic Bargaining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Case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Zhou Xueguang and Lian Hong • 80 •

Bargaining between supervising and subordinate agencies is a ubiquitous phenomenon in governmental processes, taking place in specific organizational context and structured by the rules of the game. Hence, bureaucratic bargaining provides a port of entry from which to observe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nd behaviors. In the proposed sequential game of bargaining between a principal (e. g. a provinci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and an agent (e. g. a municipal environmental agency), we identify two strategies—“routine” vs. “mobilizational” mode—available to the principal. The agent can choose from three response strategies in its subsequent move: “formal bargaining,” “informal bargaining” or “quasi-exit.” When the mobilizational mode is adopted by the principal, quasi-exit is the best choice for the agent; if the routine mode is present, the agent has more flexibility in choosing among the three alternatives.

(6)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Decline in the Suicide Rate in China

Zhang Jie and Jing Jun, et al. • 97 •

The period from 1987 to 2008 saw a substantial decrease in the suicide rate in China. This paper employs relevant national data to describe China’s total suicide rate and its gender and urban-rural distribution and proves that the yearly decrease is significant. It also conducts a relevance and time series analysis of the suicide r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migrant population.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can be found between the suicide r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ncrease in the migrant population. With this as a theoretical hypothesis, this paper uses the change in the context of strain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icide r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It shows that the decrease in the suicide rate is largely attributable to the weakened conflict context.

(7) The Transition from Kant’s Questions to Foucault’s Qu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nlightenment and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Yu Qizhi • 121 •

Kantianism serves a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source for the philosophy of Foucault, who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evolution from critical philosophy to pragmatic anthropology as well as to the four significant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asked by Kant: What can I know? What ought I to do? What may I hope? What is man? These are what is called Kant’s Questions, among which the last is a summation of the three preceding questions. In his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Foucault provided a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upon these questions and their answers and put forward four questions of his own (Foucault’s